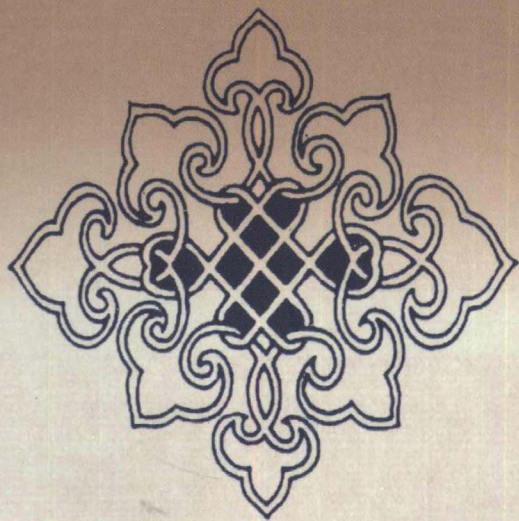


徐兴海 著

《广雅疏证》 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雅疏证》研究/徐兴海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2

ISBN 7-80643-658-8

I. 广... II. 徐... III. 广雅疏证—研究
IV. H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298 号

《广雅疏证》研究

著 作 者	徐兴海 著
责任编辑	王华宝 周立波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9.5
印 数	1—2000 册
字 数	22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658-8/H·22
定 价	16.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1744—1832)撰。王念孙通过为《广雅》作“疏证”，揭示了汉字表义“以声音为纽带”的规律，“以古音得经义”，从而使得汉语言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表现了高度的创造性。同时，对《广雅》进行了精到的校讎，使得这部训诂学的重要著作有了一个可靠的精校本。

《广雅》，三国时魏文帝太和年间博士张揖撰，其内容始于《释詁》，终于《释兽》，分上中下三卷，18150字。张揖，《魏书》无传。《魏书·江式传》记江式上表，在评述字书撰写史时提到张揖，称“魏初博士、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詁》。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又颜师古《汉书叙例》提到张揖：“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人，魏太和(228—237年)中为博士。”张揖所撰书，今仅存《广雅》、《埤苍》、《古今字詁》皆已亡佚。

张揖撰《广雅》，是为了接续《尔雅》，增广《尔雅》收词范围。其《上广雅表》谓：“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詁，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撙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覈，以著于篇，凡万

八千一百五十文。”与《尔雅》相较，增收词语 2343 条，即释 2343 事。《广雅》之体例、篇目，完全依仿《尔雅》。

对于《广雅》的价值，王念孙有很高的评价：

昔者周公制礼作乐，爰著《尔雅》。其后七十子之徒，汉初缀学之士，递有补益。作者之圣，述者之明，卓乎六艺群书之铃键矣。至于旧书雅记，诂训未能悉备，网罗放失，将有待于来者。魏太和中，博士张君稚让继两汉诸儒后，参考往籍，遍记所闻，分别部居，依乎《尔雅》，凡所不载，悉著于篇。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讖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诂训也大矣。^①

所以《广雅》一直被看作是研究汉魏以前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

隋时曹宪为《广雅》注音，成《音释》四卷。除依字注音外，间或说明字体，略有诠解。因避隋炀帝杨广名讳，称作《博雅音》，因之《广雅》又称《博雅》。《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广雅》四卷，张揖撰”，又“《博雅》十卷，曹宪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揖《广雅》十卷”，又“曹宪《博雅》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张揖《广雅音》三卷”，又“曹宪《博雅》十卷”。是唐时《博雅》又称《广雅》，而曹宪所注音本仍称《博雅》，其书名《博雅音》，同时，《广雅》与《博雅音》各自单行。自曹宪为《广雅》注音之后，唐代似未见有研治《广雅》者，因两《唐书》未见著录。《明史·艺文志》亦未著录有明一代有研治之作。明刻本《广雅》开始附曹宪音于正文之下。至清代乾嘉时期，方有王念孙治《广雅》，时距曹宪音注已一千多年了。

① 《广雅疏证·自序》。

王念孙生于乾隆九年，卒于道光十二年，享年八十九岁。字怀祖，号石渠，又作石臞，高邮州（今江苏高邮）人。父安国，雍正二年一甲进士，乾隆初年官至吏部尚书。念孙少年时随侍在京，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四岁时即口授《尔雅》，八岁时读《十三经》毕，旁涉史书文籍，无不该览融通。父亲使其师从皖派领袖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学，熟于“汉学”之门户。可说是少年时即已打好一生做学问的基础。乾隆皇帝南巡时，王念孙以大臣之子迎接鸾驾，献上文册，被赐为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选为庶吉士散馆，改为工部主事，升任郎中，擢任陕西道御史，改吏科给事中。后历任河官，为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曾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史称其音韵学超出段玉裁之上：“于支、脂、之三部之分，段氏《六书音韵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①

王念孙的一生可说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做官，一是做学问。做官时痛快淋漓之事为嘉庆四年“首劾大学士和珅”，因其“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最有实权之时为任河道，获罪亦因河道，不得不“自引罪，得旨休致”。王念孙做学问比做官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以至于现在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不能不提到他，不能不肯定他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广雅疏证》。

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天，王念孙于陕西道御史任上开始为《广雅》作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自谓心力尽瘁于此，“殚精极虑，十年于兹”。《广雅疏证》完成后的三十年里，王念孙还不断对之完善补充，改正者五百余处，“其中有新补充的书证，也有对原引文讹误的纠正，更有一些是将原疏证文加以重新改

^① 《清儒学案·石臞学案》卷一百。

写”^①。另外,王念孙又据《广雅疏证》以指导《读书杂志》等书之撰写,儿子王引之《经义述闻》亦与此书有密切关系。据此可知,王念孙一生之精力倾注于此,本人也将此书作为代表作。这些补正成果,罗振玉整理为一书,名为《广雅疏证补正》,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广雅疏证》时将之作为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徐复先生主编《广雅诂林》时将其分条列于《广雅疏证》对应条目之后,甚便读者。

王念孙总结《广雅疏证》之主旨道: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扞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②

《广雅疏证》最大贡献即在于此,王念孙之创造亦在于此。王念孙之语言学体系迥别于此前的研究,即植根于此。

我国古代的训诂学研究非常发达,随着经学地位的确立,注疏之学更成为一门无人不习之学问。将这些注疏整理起来,就成为词典与字典。《尔雅》与《说文解字》即是代表之作。《说文解字》以字的形体为释义的基础,《尔雅》以意义相同者归类训释,实则仍旧脱离不了字的形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的训诂学是以字的形体为基础的。这一体系限制与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当代语言学家王力对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予以彻底的清

① 钟宇讯:《广雅疏证·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1版。

② 《广雅疏证·自序》。

算,并且推许段玉裁、王念孙进行了一场训诂学的革命,使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①

王念孙之研究与先前有了根本的变化,提出了“诂训之旨,本于声音”的纲领以代替先前的以形为主的纲领,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对先前训诂学的否定。这一纲领抓住了训诂学研究的根本,因之发前人所未发,示前人所未明,为汉语言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因其疏证采取了实证的科学方法,所以实现了否定之否定,使语言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表达了决意创立新的体系的态度,宁愿冒他人“凌杂之讥”,也要独辟蹊径,“就古音以求古义”。同时,为了避免“凌杂”之嫌,王念孙处处用心,着意贯通融会。郑樵《通志·总序》谓: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

^① 《中国语言学史》,第156~15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患。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王念孙深知“会通之义”,于《广雅疏证》中处处融会贯通。具体做法是,将《广雅》不同条之字之训释前后贯通,将《广雅》不同卷之相关训释贯通,将《广雅》与《尔雅》、《说文解字》、《集韵》、《众经音义》等字书、韵书相贯通,将《广雅》之训释与先秦典籍之用字相贯通,将《广雅》之训释与古人之训释相贯通,等等。在这些贯通之中,又以声音为纽带,将看似无关实则同族的字融会贯通,其对词族的研究成为一大特色。如此一来,实现了“同条共贯”、“举网必契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从而使《广雅疏证》与清代乾隆以前所有相关之训释融会贯通,并且以声音贯穿之,“好比散钱在地,他却用了一根索子把它们贯串起来了”。王念孙的创造在此,功力亦在此。

《广雅疏证》运用了许多训诂方法,如引申、对文散文、相对成文、反训、声训、通假,又特别揭示了以声音为纽带结成的词族,并对表义词语之间的转换生成予以发明。对所揭示的规律,或引证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之,或证以今言俗语,或证以人名训诂,这种方法可说是科学的了。

对于王念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与王念孙同时代的人即已给予了极高评价。

段玉裁为语言学大家,与王念孙为挚友,于生活困苦、刻印《说文解字注》时均求援于王念孙,亦都能得其力。段谓王念孙为“天下一人而已”。他说: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

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周官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形也；转注、假借二者，馭形者也，音与义也。三代小学之书不传，今之存者，形书《说文》为之首，《玉篇》以下次之；音书《广韵》为之首，《集韵》以下次之；义书《尔雅》为之首，《方言》、《释名》、《广雅》以下次之。《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者，转注、假借之条目也。义属于形，是为转注；义属于声，是为假借。稚让为魏博士，作《广雅》，盖魏以前经传谣俗之形音义汇萃于是。不孰于古形、古音、古义，则其说之存者，无由甄综；其说之已亡者，无由比例推测，形失则谓《说文》之外字皆可废，音失则惑于字母七音，犹治丝棼之；义失则楮于《说文》所说之本义而废其假借，又或言假借而昧其古音。是皆无与于小学者也。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①

段玉裁的评价说明王念孙训诂研究的特点在于以形、音、义三者互求，以形之古今、音之古今、义之古今互求；并指出其突出贡献在于“以古音得经义”，即以古之读音求其字义，求其不同字之联系，求词之家族之共同特点。说明了王念孙训诂学研究之目的，乃为了通经，为了经义之明彻，训诂在他只是手段，目的只在“明经”。因王念孙高举旗帜，“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遂成为清代训诂学的宣言。又谓其为《广雅》做疏证，只是借此“证其所得”而已。段玉裁谓王念孙为语言学研究古往今来之第一人，这一评价实在不是过誉之词。

阮元为王念孙之弟子，他对王念孙在语言学上之贡献则说得

^① 《广雅疏证序》。

更明白些：“此乃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字、戴氏东原所未及。”阮元作为弟子辈之评价，认为其师远在乾嘉学派领袖惠栋、戴震之上，也是为段玉裁“天下一人”之评价作注。

梁启超为当代人，以革命创新之精神审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同样给予王念孙以极高评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一代所宗。”“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实清儒治小学最大成功处，而这种工作，又以高邮王氏父子做得最精而最通，《广雅疏证》实为研究‘高邮学’者最初应读之书。”^①当代国学大家王国维亦谓“先生之精密，要在戴、段二家上也”。^②语言大师章太炎盛推王念孙父子精研故训，所到冰释，人以为无间然矣。又谓古韵学到了王念孙，已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

学者或将《广雅疏证》与《水经注》相提并论，实则二者有同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二者均“借题发挥”，借注释与疏证原书而与原书发生关系。不同之处在目标不同。《水经注》追求详备旁通。所谓详备，《水经》原记水道一百三十七条，《酈注》补充为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增加近十倍。注文文字为原书之二十倍。所谓旁通，以水道为纲，详尽地记述各河流经的地方，广泛地介绍风土人情、历史遗迹，注意到自然环境的变化。引书多达四百三十七种，后多亡佚，又贵在博采汉、魏碑刻。《水经注》之着眼点在扩充线索，增加资料。各水系一一独立，无贯串之思想蕴含其中。《广雅疏证》之文字为《广雅》之数十倍，明张揖之思路，补《广雅》之例证，释《广雅》之文词，示《广雅》之体例，这一点上与《水经注》相同。但与《水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

经注》根本不同在于,《广雅疏证》着意在贯通融会,不使《广雅》之各字、各条为分散之独立体,而是将各字、各条之内在联系揭示出来,以声音为纽带使其成为几千年汉语言文字之缩影之纲领。在具体的资料补充之上,有一主旨贯串并引领。故《水经注》之于《广雅疏证》,一为“我注六经”,一为“六经注我”,自有不同。

王念孙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有其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以客观而言,其所生活的乾嘉时代是一个古典文献整理的伟大时代。到此一时期,我国的文献典籍已是汗牛充栋,亟待整理,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献学家,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还是版本、目录、校勘,或是辨伪、辑佚,无论哪一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都有一批顶尖级的学者产生。以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所记,王念孙所出生的乾隆九年,“是年惠栋 48 岁,全祖望 40 岁,卢文弨 28 岁,庄存与 26 岁,江声 24 岁,王鸣盛 23 岁,戴震 22 岁,纪昀 21 岁,王昶、程瑶田 20 岁,钱大昕 17 岁,朱筠 16 岁,毕沅 15 岁,段玉裁 10 岁,任大椿、丁杰、章学诚 7 岁,崔述 5 岁,邵晋涵 2 岁,汪中、钱坫、钱大昭 1 岁”。又王念孙 5 岁时,方苞卒;7 岁时,刘台拱生;9 岁时,孙星衍、陈鱣、朱彬生;11 岁时,黄叔琳卒;18 岁时,江藩生;20 岁时,焦循、黄丕烈生。这些人物,都是乾嘉时期学术活动的中心人物,每一个人的名声都如雷贯耳,每一个人的功业都如虹贯日。王念孙与他们,或是师生,或是朋友,或是忘年之交,他们给王念孙以影响,把此一时代恢弘的学术精神传染给他,把精致严密的求学方法传授于他,以敢于创新的作风熏陶于他,使他成为时代之一分子,成为此一时代之代表人物。正是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就时代。

此一时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研究形成风气,卢文弨、钱大昭、王念孙三人同时研治《广雅》;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又有王筠、桂馥、朱骏声均有《说文解字》研究成果;治《尔雅》者,则有郝

懿行；有关方言俗语之作，有钱大昕《恒言录》、钱大昭《述言》、郝懿行《证俗文》、杭世骏《续方言》，因之王念孙之研究，有切磋之良友，有竞争之对手，亦有批评之诤友，这些又是良好的学术氛围。

以主观的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所积累的知识，所从名师把他一下子带到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更好地了解研究之全貌，把握研究之课题，都给了他以便利条件。另外，优渥的家庭条件，几十年的官宦生活，稳定的生活来源，都支持他专心致力于学问。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法，他不是“书袋子”，仅仅做活的字典，而是有创造力，有悟性，有分披枝节、直接进入问题本质的能力。同时，他有忍耐力，有毅力与恒心，几十年如一日之积累，使他硕果累累。八十九岁的高寿，健康的身体，使他在学术之路上比别人走得更远，果实结得更多。

王念孙对于校讎学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他认识到校勘《广雅》一书的重要性，在给刘台拱的信中说：“是书虽不及《尔雅》、《方言》之精，然周秦汉人之训皆在焉，若不校注，恐将来遂失其传。”王念孙对《广雅》的校讎，集中了古老的校讎学所积累的经验，缜密、求实。首先强调校讎之必备条件，要多备众本，“值本即校”，不惜下笨工夫。所发明的勘误类例亦发人深省，并于校讎中探求各字讹误历史，指正《广雅》之失。同时，对曹宪注音做了很好的校勘。所做校讎之中，采用了各种可能的方法，并发明文字讹误的规律，足以启迪后人。王念孙校讎过人之处，在于将声韵的道理运用于勘误之中。其校讎之可贵，还在于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孤证不立，不说猜测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王念孙还把《广雅》校讎之精神推广于《读书杂志》，儿子引之又将其发挥于所述的《经义述闻》中去，发前人所未发，使《广雅疏证》成为校讎学之代表作。

《广雅疏证》又是王念孙父子合作的成果。除卷十标明“引之述”之外，其他许多地方都有王引之的意见。

王引之,字伯申,号曼卿,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享年六十九。嘉庆四年一甲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自幼随父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父子讨论,相互引发。阮元撰《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称誉“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并非溢美之辞。今人题联于高邮王念孙父子纪念馆曰:“不皖不吴独开一派,是父是子同有千秋。”高度地概括了父子的学术特点和完美合作。

王氏父子著述颇丰,王念孙有《广雅疏证》二十二卷,《释大》八卷,《方言疏证补》一卷,《读书杂志》八十二卷,《余篇》二卷,《王石臞先生遗文》四卷,《补编》一卷。编纂《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王引之有《经义述闻》三十二卷,述父亲对经学的看法;《经传释词》十卷;《太岁考》二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字典考证》十二卷;《王文简公文集》四卷,《补编》二卷。

《广雅疏证》除卷十外,标明王引之按语之处有:卷三上“道也”条疏证王引之按说明《康诰》“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女瑕殄”句中,当以“远乃猷裕”为断句,谓“远”乃道之义也。卷三下“蓐,厚也”条疏证王引之谓“蓐食”不当注为“寝蓐”、“床蓐”,而为厚食,丰厚之食。指出杜预、张晏注误。又同卷“跼,止也”条疏证王引之谓“时与跼声近而义同”,又证《毛诗正义》之误。卷四上“诋也”条疏证附王引之考辨,谓郭璞《尔雅注》、《说文解字》“𡗗”字注有误。又卷五上“易、与,如也”条疏证王引之谓《论语》“贤贤易色”之“易”当训为“如”,又纠正郭璞《尔雅注》谓“易”为“易代”之误。同卷“仪、愈,献也”条疏证全引王引之之说,谓“古音‘仪’与‘献’通”,“‘黎仪’即《皋陶谟》之‘万邦黎献’也,汉碑多用经文”。又指出洪适《隶释》读“仪”为“旄倪”之“倪”,非是。等等。王引之主要针对古人注疏提出不同意见,所纠正的还有,《尔雅》有字误,《文选》有字误,韦昭注《周语》有误,《孔传》训《尧典》有误。从这些例证可知,王引之

所提出的都是带有影响的重大问题,且所挑战的是十分难于发现错误的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结论。解决这些问题都很大的难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王引之揭示许多古汉语常识,发现好多规律。也正是因为有王引之的参与,提高了《广雅疏证》的层次。

《广雅疏证》是一座宝库,亟待进一步发掘。鄙人不才,仅就校雠学与训诂学诸问题提出看法,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本书所引《广雅疏证》为畿辅丛书刊本。又参以中华书局影印《广雅疏证》,钟宇讯点校,1983年5月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本影印之《广雅疏证》,后附《广雅疏证补正》。

本书所引《广雅疏证》因避讳而改“玄”为“元”者已经改。

徐兴海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广雅疏证》之校雠学

第一章 《广雅疏证》之勘误类例	(5)
一、校雠必备条件	(5)
二、勘误类例	(9)
第二章 校雠内容与方法	(39)
一、校雠内容	(39)
二、校雠方法	(43)
三、所揭示文字之讹误规律	(63)
第三章 据《广雅》正他书之误	(65)
一、他书讹误类例	(65)
二、分析他书讹误原因	(65)
三、据他书证他书之误	(70)
四、《疏证》不当之处	(71)

下编 《广雅疏证》之训诂学

第四章 《疏证》对《广雅》之研究	(75)
一、《广雅》与《尔雅》	(75)
二、发明《广雅》之训诂所从来	(76)

三、揭示《广雅》之训释	(78)
四、揭示《广雅》一条之内各词、各卷条目之间的关系	(80)
五、有未予疏证者	(86)
六、正《广雅》失误	(88)
第五章 与词义转移相关的训诂方法	(91)
一、引申	(91)
二、对文散文	(98)
三、相对成文	(101)
四、反训	(105)
第六章 声训	(111)
一、声训类例	(111)
二、对声训结果之论证	(119)
三、词族研究	(122)
第七章 通假	(144)
一、《疏证》与通假	(144)
二、通假字类例	(150)
第八章 词的转换	(190)
一、以词与词之关系划分	(190)
二、以对应的形态划分	(192)
三、其他转换例句	(195)
第九章 其他几种训诂方法	(201)
一、辨析词义	(201)
二、双声叠韵	(211)
三、合言、重言、单言、合声	(216)
四、证以今言、俗语	(225)
五、人名训诂	(230)

六、发明古人行文规律	(235)
七、存疑	(239)
第十章 正他书之误	(243)
一、前人注释之误	(243)
二、解者多失之	(260)
三、补正前人之注	(272)
附 录	(274)
《广雅疏证》引书目录	周法高 (274)
主要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86)